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1937年12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的周恩来应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之邀，向广大师生作《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报告。在这篇报告中，周恩来从抗战形势出发，分析了当时青年的思想实际，结合我们党全面抗战路线政策，深刻阐发了抗战初期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并对广大青年提出了殷切期望。

看清方位——这是一个“变动的战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时代”

现实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总是处于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人。人只有弄清自己所处的时代、所处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时代总问题，才能明确自身目标任务，分析所面临的机遇挑战，探索出符合实际的前进路径。在《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中，周恩来坚持从“大处着眼”，把报告的切入点放在当时抗战形势分析上，明确指出，“今天，无疑是个变动的战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时代”。这里的“变动的战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该作如何理解？周恩来论述说，“这个时代是战斗的。这个时代不能与过去‘五四’、‘五卅’、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代相比。过去是对内的局部的政治斗争，这一次却是对外的全面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抗战。现在是整个被压迫、被屠杀、被奸淫、被侵略的中华民族的人民起来反抗的时候，所以现在的形势全变了”。从这一论述可以看出，周恩来的这一分析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因而其判断是科学的、准确的。



中和位育：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及其治学理念



潘光旦（1899—1967年），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学家，在优生学、社会思想史、家族制度史、儒学哲学、民族史等领域留下了数百万字的作品。潘光旦治学以时代问题为导向，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与西方的科学知识进行结合，提出“新人文史观”，力图寻求人类发展的“中和位育、遂生乐业之道”。“中和位育”是潘光旦基于对儒学思想的创造性解释而提炼的重要概念，被视为其新人文思想的核心，是社会学理论的一种创新以及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体现。

以传统儒学为基础的“新人文史观”

潘光旦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新人文史观”。这一思想的核心是潘光旦对于“中和位育”这一概念的创用。潘光旦重视以中国社会思想资源为本引入西方科学的观点，有意识地建立“新的学术与旧的经验”的关系。“中和位育”即是他引用儒家经典《中庸》里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义提炼而成的核心研究概念。“位育”为“安其所”“遂其生”，即天地万物各处其位、繁育滋长之意。潘光旦认为“安所遂生”即“位育”，为“一切生命的大欲”。而“中和”则是实现“位育”的方法，是天地万物的“化育”之道。在潘光旦的阐释中，“位育是一切有机与超有机物体（生物与社会）的企求”，“位育就等于二事（物体与环境）间的一个协调”，“讲位育，当然要有两个条件。一是生物个体或团体。一是个体或团体所处的环境”“环境可以大别为二，一是体内的环境，一是体外的环境。体外的环境，就人而论，又可以



把准方向——明确当时青年一代“应该努力的”四个方向

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总蕴含着解决这个时代问题的方向。周恩来指出，“敌人要我们每个人、每个人的子子孙孙都做亡国奴。我们要求生路，便只有抗战，便只有坚持抗战到底”。抗战到底是当时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责任，对于青年来说，身处战斗洪流，青年更应拿出自己的历史担当。周恩来强调，“我们中国的青年，不仅要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救国，建国，我想‘任重道远’这四个字，加在中国青年的身上是非常恰当的”。这里，从时代问题出发，周恩来提出了当时青年的两大历史任务，即救国和建国。救亡图存具有现实紧迫性，这不难理解；而在救国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建国（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这就体现出周恩来高远的战略眼光。在提出青年两大历史任务后，结合当时革命形势，周恩来为广大青年



用好方法——要分散到群众中去、使理论适合于实际、在攻坚克难中迎接光明未来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为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朝气蓬勃、思维敏捷，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最具有创造活力，但同时也相对缺乏工作经验，迫切需要科学理论指导。有鉴于此，在指出广大青年的努力方向后，周恩来又对青年的工作方法作了分析。一是要分散到群众中去。周恩来十分重视群众工作，这一点在其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以及《关于武汉工作问题》等文章均有体现。卢沟桥事变

新人文思想的经世致用之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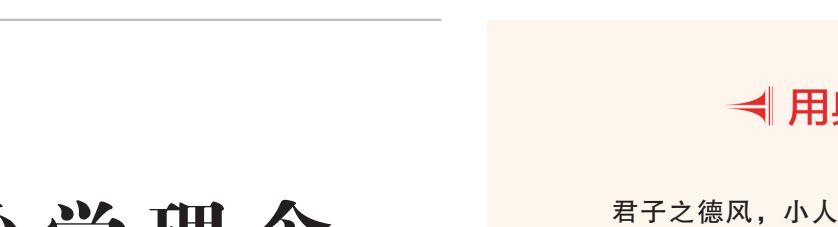
潘光旦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以儒学为根基倡导民主自由，体现了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学术情怀。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从其新人文思想出发，对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的平等、民主与自由观展开了评骘。经济方面，他根据孟子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引申“物不齐”即“自然之不平”理论，提出应当以“公道”代替西方经济理论所倡导的“平等”概念，认为真正的平等是按人的才能与机会匹配，此谓“公道”而非“平等”；在社会中“人生而平等，但不意味着不区分才智德行而用；后天教育可以促进人的平等，但不意味着无视遗传而忽略因材施教。潘光旦认为，教育的实质是品格的培养，即人自身的“个性”与人与人之间的“通性”达至“和”的状态；而达至“和”则需要“自明”和“自强”，即有自知之明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两者分属于智识与情感的范畴，自明重在知，自强重于行，教育的真谛在于知行合一。政治方面，他认为儒家思想早已包含了西方民主政治所包含的民有、民享和民治等有关政治基础、目的和过程等方面的内容，如孟子的“民为贵”即民有，儒家的“民父母论”即民享，“贤人政治论”即民治，中国并不缺少民主政治的精神。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不仅推动了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与中国国学和国情的结合，而且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学科发展和文化自信作出了贡献。



指出了四个努力方向：一是“到军队里去”。显然，这是挽救民族危亡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周恩来强调，“建立生力军，充实我们的旧队伍，责任都在我们青年朋友的肩上”。鼓励广大青年参军，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练就上阵杀敌的本领，这是救亡图存、保家卫国的现实要求。二是“到战地服务去”。战地的广大群众“到处在流浪着，彷徨着。要起来自卫，要起来斗争，却没有人领导”。这就需要青年一代去做群众工作，把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领导着他们去打游击战，去配合正规军的行动”。三是“到乡村中去”。全面抗战初期，虽然我们已经失去了许多地方，但后方还有广大的乡村。“我们要继续作战，继续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必须动员起广大的群众到军队中来。”周恩来特别提醒说，“要改良过去那种不合理的动员方式”，有组织地、直接地下乡动员群众，使农村壮丁勇敢奔赴前线。要高度重视优待抗日军人家属问题，让参军没有后顾之忧。四是“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能再让华东、华南象东北四省一样，给敌人安安稳稳地拿去了”。我们要锻炼我们自己，秘密地把救国

用好方法——要分散到群众中去、使理论适合于实际、在攻坚克难中迎接光明未来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为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朝气蓬勃、思维敏捷，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最具有创造活力，但同时也相对缺乏工作经验，迫切需要科学理论指导。有鉴于此，在指出广大青年的努力方向后，周恩来又对青年的工作方法作了分析。一是要分散到群众中去。周恩来十分重视群众工作，这一点在其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以及《关于武汉工作问题》等文章均有体现。卢沟桥事变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讲话原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坚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领导机关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机关，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对全党全社会都具有风向标作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上面要求人、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管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做表率、打头阵。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月8日）

【出处】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春秋）孔子《论语·颜渊篇》

【解读】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出自《论语·颜渊篇》，意思是说，上层执政者的道德品质好比是风，平民百姓的道德品质好比是草，当风吹到草上面的时候，草就必定跟着倒。春秋时期，鲁国权臣季康子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政事，就问孔子：“如果杀掉无道之人来成全有道之人，怎么样？”孔子回答道：“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采用杀戮的手段呢？您只要想行善，老百姓自然就会跟着行善。”并以“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作譬。由此形成了成语“草偃风从”，比喻在上者能以德化民，则民之向化，犹风吹草仆，相率从善。汉唐时期的儒家学者注疏《论语》中的“君子”和“小人”，虽然大都是“以德言”，但也有“以位言”的。对于“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西汉大儒孔安国注曰：“加草以风，无不仆者，犹民之化于上。”显然，这里把“君子”和“小人”关系解读为上下关系，是“以位言”，而非“以德言”。2020年1月8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古语，旨在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坚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从而形成“头雁效应”，这是我们党走向成功的关键。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正是因为有一大批做表率、打头阵的英雄模范，我们党才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树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标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须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杨立新）